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历史轨迹*

张渝政¹, 唐廷英²

(1. 重庆工商大学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2. 重庆工商大学 图书馆, 重庆 400067)

[摘要] 自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一种工具, 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及其在现实中的展开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的反思与总结,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既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伟大而光荣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历史轨迹

[中图分类号] A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98(2006)06-021-06

2001年9月,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风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了: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2003年9月,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 要“紧密结合时代特征和我国国情,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走自己的路。八十多年来, 我们党正是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 领导人民夺取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形成经过了一个长期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提出和发展,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多年探索和思考的产物, 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实践的产物。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日益勾结起来, 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凄风

苦雨中, 站立起一批批有脊梁的中国人, 为了反抗外敌, 改革现状, 争取民族独立、祖国富强、人民幸福, 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探寻民族振兴的方略和契机, 进行了一次又一次英勇不屈的革命斗争。从太平天国的农民战争、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 都是规模比较大的反抗斗争。先进的中国人, 为了救中国, 不惜千辛万苦, 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 从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到孙中山等, 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 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对于这些具有忧国忧民光荣传统的反抗者、求索者来说, 20世纪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是“近代中国的出路”问题, 即“中国向何处去?”然而, 先进的仁人志士的上下求索并没有给近代中国找到和指明出路,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 “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 即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 共计七十多年中, 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1]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终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 中国先进分子和先进阶级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解救中国

* [收稿日期] 2006-12-05

[作者简介] 张渝政(1956-), 男, 汉族,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 重庆工商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教授。
唐廷英(1958-), 女, 汉族,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 重庆工商大学图书馆, 馆员。

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一经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就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但是,单纯的选择是不够的,拥有了革命的武器和工具,并不表明就能够正确地使用它。这里还有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方法问题。五四时期,早期的共产党人如李大钊就敏锐地意识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还须使之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虽然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但在实际上已经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也就是说,要让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的,能让中国人理解和运用的理论武器,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客观依据。^[2]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时代背景看,“中国化”概念首先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而言的。前苏联共产党及共产国际在早期中国革命中曾给予中国革命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和干预。这样一来,只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受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理论影响的中国共产党人,其头脑当中的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充满了俄国的味道”,在他们这时所起草的文件当中,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其中的浓厚的俄国色彩。这时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几乎完全沉浸在对俄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之中,而且明确认为:“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征,也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俄国革命的方法,必然也是中国革命的“不二法门”,俄国的革命靠的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产业组合”实行“总同盟罢工”,中国的革命也只能是一样,因为“从生产和分配的方法上看起来”,世界上的国家“都是一样的——都是资本主义式的”。进而,他们甚至几乎一致认为,中国革命也只有像俄国一样实行社会革命才有出路,即必须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为最直接的斗争目标。总之,“走俄国人的路”,“一切均借俄助”,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初走向马克思主义时的口号。这句话突出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心理和中国革命的初期特点。因此,这也使得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最初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失去自身的独立性,使得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很大程度上竟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3]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针对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而言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现实依据。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从提出到现实的展

开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演变过程。

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既不是原来典型的封建社会,也不同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极大的特殊性。社会性质的这种特殊性反映到中国革命中,也使得中国革命表现出极大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的革命既不同于西方完全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同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更不同于旧式的农民革命,它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这种特殊性使得它对理论发展有着更特殊的要求。^[4]虽然,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成立的政党,但马克思主义只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它自身不可能为中国革命提供现成的答案。由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立即投入到激烈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这个问题,在很长的时期里缺乏认真的讨论,因而在正确对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党也出现过几次大的挫折。比如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拱手将革命领导权让给国民党,导致大革命失败;王明的“左”倾错误,使我党在苏区的力量损失90%,白区的力量损失100%,差一点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在中国革命几度遭受曲折反复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最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也是最先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人。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重要报告,报告第一次从理论与实践上对已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进行了表述。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在正式提出并形成全党共识前,毛泽东,已多次表述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

首先反对本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思想先导。早在三十年代初,毛泽东就已经注意到党内存在某种轻视实际,唯书唯上的倾向,因而提出过反对“本本主义”的观点。在1930年5月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唯书、唯上的思想,首次划清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界限,毛泽东从理论与实践、实际的关系的角度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

本主义。”^[5]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首次划清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的界限,并且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富有哲理的两句话,一个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一个是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这些话都是有针对性的,闪烁着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和坚持独立自主的思想光辉。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 and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最早觉醒。^[6]

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完全地确立了毛泽东和他所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地位。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就是由毛泽东来做的。在这个报告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那一节里,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民族的特点、具体情况的关系的角度提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7]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表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是说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其表现形式应当是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把这一问题称之为“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由此引起全党高度重视。

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又说:“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8]

在1941年5月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从立场观点方法与具体理论和策略的关系的角度阐述说:“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9]

总之,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就没有胜利可能;而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就必须首先使马克思主义彻底中国化、民族化;而要想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又必须首先做到立足于中国实际,即必须时时处处地站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通过毛泽东同党内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不懈的斗争,通过1942年2月开始的在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及持续三年之久的思想解放和思想教育之后,通过全党的共同努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原则终于得到了全党的支持和肯定。从1942年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之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词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文章和报告中,并在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中间形成了广泛的共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不仅在党内开始广泛使用,而且其含义也在逐步扩展和深化。就是说,不但要按照中国的实际灵活的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且要创造出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这种认识上的拓展,意味着已经把运用马克思主义同发展马克思主义紧密结合起来,把中国化作为一项原则和任务,同界定这项事业取得的成果结合起来。到这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被全党所承认,并找到了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硕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并对其基本内容做了初步的总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表述——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经历了一个过程。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同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指示:要宣传“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学说和主张”。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

道路》一文中,首先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提出后,很快被全党同志所接受。在此前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同志纷纷发表文章或演说,论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1945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理论贡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10]在诸多的关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体系、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同志的学说等多种提法中,经过选择,到中共七大的时候,最后统一起来。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在党的“七大”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才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党的重要文献中,这就是刘少奇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深入论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从九个方面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第一次构建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报告指出:“毛泽东思想,——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11]“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12]“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新,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13]刘少奇的报告是党的文献和领导人著作中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最频繁的一篇。它以伟大事业本身的理论高度,初次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总结。

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党的七大的一个重大历史性贡献。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经过20多年的艰苦探索,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

至此,马克思主义真正被赋予了一种鲜明的中国民族形式,即毛泽东思想的形式。中国共产党开始正式承认以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最高指导思想,善于从中国实际需要出发的毛泽东取得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终于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三

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没有也不可能到此结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在现实中的展开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党的七大后不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说法突然从党的文献及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中销声匿迹了,建国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类的提法已经悄无声息。毛泽东除很少场合继续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外,更多的是使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和具体实践相结合和与之统一的提法。中国化与相结合两者有何区别呢?龚育之同志的解释是前者中国化的提法是在语言上更加简洁通俗的表述,这个相结合则是在学理上更加精确,细致的表述。两种表述的含义是完全一致的。我认为在肯定“两种表述的含义是完全一致的”前提下,我们不能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向反对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而提倡马克思主义应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毛泽东,不用“中国化”的提法而用“学理上”的提法?

事实上,党的七大后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前苏联共产党的反对。前苏联共产党赞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持保留态度。因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没有讲过马克思主义要民族化、俄国化,没有讲过马克思主义要与本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

1948年6月28日共产党情报局作出了一项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谴责南共领导人的所谓民族主义,反苏和亲资本主义的倾向。毛泽东和中共对来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变化一向十分关注,共产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谴责,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的警惕,中共必须小心谨慎,稍有差错,“民族主义”的大帽子就会被戴到毛泽东和中共的头上。1948年下半年,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已经是“曙光在前头”,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这也意味着中共将面临着依靠前苏联的帮助,为避免前苏联方面发生误解,中共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的表达形态——毛泽东思想的提法。^[14]

其次,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强调的是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它说明,只有适合这种特殊性的革命理论,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实际上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决心,即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这样做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然而,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人们在强调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往往忽略马列主义;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列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会,认为二者是两回事。最先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予以纠正的人是毛泽东。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学生与先生的关系,二者是一回事,而不是两回事。因此,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产生了在出版物和党的文件中不再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想法。

1949年1月他在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指出,将草案中“毛泽东思想”一律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国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过程中他又提议,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文中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统统删去。1954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误解。我们是分店,总店还是马克思、列宁。马列主义是主干,我们是枝叶。筹备党的“八大”时,毛泽东同志再一次建议党的正式文件上不要用“毛泽东思想”。^[15]

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结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16]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章没有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可见,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不提“毛泽东思想”是一致的。再度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到上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以后,苏共领导人直接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认为这是民族主义。具体的矛头所指就是刘少奇在七大上提出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本来是毛泽东提出的,前苏联方面为什么要以刘少奇为直接攻击的对象呢?这大概是因为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讲的这个话,已经过去了20多年。毛泽东选集又对这一提法做了改动,而刘少奇不但在七大上的报告中频繁的使用了这个概念,而且在1950年将报告改名《论党》再版,以及后来多次印刷时,也没有进行修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等概念照旧保留在著作当中。苏共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共的指责,表明了他们以世界革命中心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高权威自居的心态。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毛泽东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又一次明确讲到“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17]毛泽东在1961年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说:“对马列主义中国化,他们也反对,我们无非是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各国具体的历史、具体的传统、具体的文化都不同,应该区别对待,应该允许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化,也就是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的这些话同样清楚地表明,尽管《毛泽东选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有所改变,但毛泽东并不认为这一提法有什么错误。相反,他始终认为中国化是必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必须包含与本国的“具体历史、具体传统、具体文化”相结合。^[18]

与毛泽东在中苏两党争论中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对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在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得到恢复使用。由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毛泽东思想日益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在这种情况下,公开站出来反对不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是根本行不通

的。在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提法的过程中,上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由于林彪、“四人帮”采取种种手法,割裂、歪曲和篡改毛泽东思想,他们或者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庸俗化、或者把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加以割裂、或者断章取义,抓住毛泽东的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片面加以引申,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出现偏差,使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种种严重的挫折,直至“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生,使国家和人民遭受到空前严重的浩劫。这种情况清楚地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是不可能通过一次整风运动或规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的。深入地和客观地认识中国社会的实际,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密切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使历史进步、民族兴盛和人民幸福的目的,是一个长期的和永无止境的任务。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广泛应用是在改革开放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理论界才重新使用了这一提法并给予高度重视。

当我们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的时候,情况不同了,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和平,一个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日益深化,中国新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需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讲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有着更为广义的内涵。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及其在现实中的展开的历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深入地、客观地认识中

国社会的实际,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程,努力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合于中国革命事业、建设事业和改革事业的具体实践并不断取得胜利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没有结束,世界在变化,中国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继续,马克思主义应该并且必须随着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变化而相应地发展和变化,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 [1][7][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402-1403.499-500.667.759.
- [2][4][14] 李秀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历史发展轨迹[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 [3] 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进程[EB/OL].澳纽华程网 <http://www.huachengnz.com>,2005-10-03.
- [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1-112.
- [6] 郑德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形成内涵及重大意义[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5).
- [9][17] 鲁振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六点研究[EB/OL].人民网 <http://theory.people.com.cn>,2006-06-17.
- [10] 新华社.红色记忆:彪炳千秋的历史盛会——中共七大[EB/OL].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cn>,2006-06-09.
- [11][12][13]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41.341-342.343.
- [15] 赵明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命名、名称演变的思考[J].文史哲,2004,(1).
- [16]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9.
- [18] 许全兴.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4).

(责任编辑:朱德东)

Historic orbit of the proposition of “Chinalization of Marxism”

ZHANG Yu-zheng¹, TANG Ting-ying²

(1. School of Politic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2. Library,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Since Marxism started to become the tool of Chinese communists to guide China revolution as a revolutionary ideology, it was unavoidable to start the process of Chinalization of Marxism. However, the providing of the proposition of “Chinalization of Marxism” and its extension in reality underwent a tortuous process. Further reflection and summarization of the historic process of Chinalization of Marxism and continuously promoting Chinalization of Marxism are not only the summarization of historic experience of China’s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which are led by Chinese communists but also are the great and glorious historic mission of Chinese communists.

Keywords: Marxism; Chinalization; historic orbit